

石窟艺术研究

○ 第二辑 ○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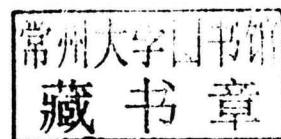


文物出版社

石窟艺术研究

○ 第二辑 ○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石窟艺术研究. 第二辑 /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编.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12

ISBN 978 - 7 - 5010 - 5242 - 4

I. ①石… II. ①麦… III. ①麦积山石窟 - 文集
IV. ①K879. 24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9407 号

石窟艺术研究 (第二辑)

编 者：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伟 周燕林

责任校对：赵宁

责任印制：张丽

封面设计：程星涛

出版发行：文物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 编：100007

网 址：<http://www.wenwu.com>

邮 箱：web@wenwu.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1/16

印 张：21.25

版 次：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10 - 5242 - 4

定 价：220.00 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非经授权，不得复制翻印

《石窟艺术研究》编委会

主 编

李天铭 孙晓峰

编委会主任

王万珍

编 委 (按姓氏笔划)

马 千 王万珍 白秀玲
孙晓峰 李天铭 刘 勤
何红岩 岳永强 张 萍
项一峰 段一鸣 夏朗云
唐 冲 董广强 臧全红

编 务 (按姓氏笔划)

王通玲 白 凡



目 录

石窟考古

- 003 大足石刻研究回顾（1945~2016年）/ 米德昉
020 敦煌石窟个案研究之省思与检讨 / 沙武田 梁 红
042 浅议后秦佛教对麦积山、炳灵寺石窟的影响 / 姜 涛 陈雪雪
051 麦积山第4窟开凿时间考论
——以对庾信铭文的解读为切入点 / 董广强
066 莫高窟考察纪行 / 韩树伟

佛教美术

- 081 广元千佛崖藏佛洞造像考 / 王洪燕
089 富县石泓寺金代早期第2窟天井图案分析 / 李 静
105 中原北方唐宋时期卢舍那法界佛像述论 / 李静杰
137 麦积山石窟北朝佛衣类型 / 陈悦新
155 试论长安与泾渭河流域佛教文化艺术 / 项一峰
183 唐代敦煌石窟造像与天台判教思想关系之考察 / 赖文英

石窟保护

- 201 麦积山石窟部分残损洞窟的复原研究 / 刘丹
238 龙门石窟洞窟渗漏水治理的新进展 / 陈建平

文献题记

- 251 吐蕃王朝的骰卜与立法
——骰卜在借贷、利息、婚姻和征兵法律中的角色
扮演（一）/ 布兰登·道特森著 王东译
280 甘肃省成县五仙洞石窟与南宋禅宗
——《五仙洞记》碑和《孚泽庙牒》碑部分内容解读 / 王百岁
300 佳县化云寺题记明清文化因素分析 / 张诗蕴

石窟考古



大足石刻研究回顾（1945~2016年）

米德昉*

内容提要：大足石刻研究发端于20世纪四十年代，迄今走过七十余载，回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历程，其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发轫期（1945~1980年）、初步发展期（1981~2000年）与纵深发展期（2001~2016年）。梳理以往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面对七十余处石窟与十余万言铭文题刻，仍有诸多领域有待学界进一步挖掘与探索。

关键词：大足石刻 研究 综述

引言

川渝地区作为中国石窟艺术的中兴地之一，遗存有数以千计大小不同的石窟区。仅川东大足而言，1392平方千米的区域内分布着百余处石窟遗迹，保存理想者76处。

大足境内发现最早的造像为尖山子摩崖石刻，其中有“永徽〇年八月十一日”题记，学界以此为大足境内开窟造像之上限。唐前期大足地区开龛镌像活动尚未兴起，石刻遗迹除尖山子案例外，仅有圣水寺与法华寺两处，数量少，规模小。迨至晚唐，这一局面有了质的改观。景福元年（892年），昌州刺史韦君靖在大足龙岗山筑“永昌寨”，并于寨西舍“禄俸以建浮图”^①，自此五代、两宋诸朝大足开龛造像之风大兴。南宋淳熙至淳祐间，僧

* 作者简介：米德昉（1972年—），男，甘肃永登人，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历史文献学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佛教艺术研究。

① 详见大足北山佛湾：《韦君靖碑》，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重庆社科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大足石刻铭文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37~43页。

人赵智凤立教派设像行道，耗毕生精力与其门人在昌（大足）、普（安岳）二地广建石窟寺，力弘其教，开创了大足石刻艺术的鼎盛期。元季遭逢兵燹及政变之影响，大足境内不再有石刻造作，明清时有所复苏，但造像气质与格调已远不及前代。

大足石刻内容关涉释、道、儒“三教”，以释教为最，尤以宝顶山“赵智凤派”禅教合一的造像最具宗教、民族、艺术与地域特色。另外石篆山、石门山、南山、妙高山、舒成岩等宋代三教造像，在内容、形式与布局等方面为国内所鲜见，是研究宋代三教融合思想难得的例证。

大足石刻在其价值上，堪与敦煌“伯仲”，与云冈、龙门“鼎足”，是中国石窟艺术在南北朝、隋唐之辉煌后，在两宋时出现的又一次鼎盛，因之被学界誉为石窟艺术晚期的“杰出丰碑”。尽管如此，其造像史实在文献中记载颇少，且语焉不详。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著于南宋嘉定十四年）是最早对大足北山、宝顶、南山等有所载录的文献，但所记寥寥数语，过于简略。继之有明末曹学佺《蜀中广记》，晚清时期张澍《养素堂文集》、陆耀遹《金石续编》、刘喜海《金石苑》等文献，所载多为碑铭，石窟造像少有涉及。

20世纪伊始，西方探险家不断进入中国西北进行调查，遂引发考古热。然早期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国人的考古活动都未涉及大足石刻。如1914年法国学者色伽兰、法占、拉狄格等一行对四川地区的古代石刻、崖墓、佛教遗迹的考查，活动主要在四川北部与西南一带，未到川东^①。1927年，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历时八年对中国西部、北部、中部进行了科考，四川地区未有涉及^②。20世纪30年代以后，有关大足石刻信息零星见于个别著述、刊物等。1930年，陈彬龢译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印行，该书中多次提及大足北山有唐宋佛像，未见详细描述^③。1935年，刘蕴华在《东方杂志》发表“四川大足之古代石刻”摄影八幅，分别为宝顶山和北山造像，是为最早直观公布大足石刻造像者^④。

20世纪40年代以后，这种局面渐有改观。1939～1940年，梁思成先生与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等学者在考察西南地区古建筑、崖墓和石刻遗迹过程中，调查了大足北山、宝顶山等石刻。1947年4月，梁思成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发表的一次学术报告中首次将大

^① （法）色伽兰著，冯承钧译：《中国西部考古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

^② 王新春：《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学史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③ （日）大村西崖著，陈彬龢译：《中国美术史》，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

^④ 参考《东方杂志》第三十二卷第五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足石刻艺术介绍给国际学术界^①。

但真正意义上由学界正式发起的调查活动是在1945年，时任中国学典馆馆长杨家骆先生得知大足石刻情况后，遂组织马衡、何遂、顾颉刚等学者一行15人赴大足，重点对北山、宝顶山、南山等处石窟寺进行了为期8天的实地调查，是为大足石刻研究史上首次正式、系统的学术考察。这次考察开启了大足石刻学术研究之门，自此之后，大足石刻“乃渐著于斯世”。

自杨家骆一行考察之始，大足石刻研究迄今走过七十余载，回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历程，其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发轫期（1945~1980年）、初步发展期（1981~2000年）与纵深发展期（2001~2016年）^②。

一 发轫期（1945~1980年）

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是大足石刻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中国相继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革”等特殊、曲折的历史时期，社会政局的动荡与变迁严重影响了学术科研事业的正常发展。尽管如此，大足石刻因杨家骆一批贤达学贵的考察而拉开学术研究之序幕。

这一时期大足石刻具代表性的研究主要以1945年的考察成果为主。此次考察重点为北山和宝顶山，考察团经过8天的工作，完成“影片一部，照片二百帧，部位图两种，摹绘二百幅，拓碑一百通，石刻目录两种”，并首次对北山佛湾、宝顶大佛湾做了窟龛编号与年代鉴定等基础工作。此外，诸学者对北山、宝顶山等处石刻之概况、缘起、作风、价值等方面做了初步探讨。其中马衡先生《大足石刻〈古文孝经〉校释》对北山古文孝经碑做了细致考证，认为此碑“可称唯一最早之古文本”。傅振伦《大足石刻南北山之体

^① 梁思成著，林洙编：《佛像的历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297页。

^② 本稿之前有五篇综述性文章：陈典：《大足石刻的研究历程》，《大足石刻研究通讯》1986年第3期（内刊）；陈明光：《大足石刻研究述评——20世纪90年代之前研究回顾》，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等：《大足石刻研究文选》（未出版），1992年，22~33页；陈灼：《大足石刻百年研究综述》，曹中建：《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9~2000》，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205~220页；刘长久：《大足石窟研究综论》，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大足石刻研究文集》（3），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2~48页。聂盛隆：《大足石刻研究（1945~2005年）著述统计与分析》，曹中建：《中国宗教研究年鉴2005~2006》，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299~314页。

范》对南山和北山石刻概况、风格、价值、镌匠等进行了探讨。陈习删《大足石刻概论》将大足石刻归结为六处（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和妙高山），对各处造像内容、年代、价值、成因等进行了较有见地的论述。上述成果以图文形式汇编为《大足石刻图征初编》一卷，附载于《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卷首，其中图 15 幅，文 7 篇^①。杨家骆在《大足石刻图征初编》序言中对大足石刻给予高度评价，“以为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

本次考察事件虽在当时颇受学界瞩目，然因受国内时局动荡之影响，此后四、五年关于大足石刻研究工作并未得到应有的推进。考察团原筹划编撰《大足石刻志》《大足石刻目录》《文史杂志·大足石刻考察专号》等皆未果。相关研究成果凤毛麟角，仅有几篇带有介绍性或初步研究的文章见诸刊物^②。如 1947 年杨家骆在《中央日报·文物周刊》先后发表的大足龙岗（北山）、宝顶山及以外区《石刻记略》三篇，分别对各区石刻给予相对整体的介绍，其中对于宝顶山石窟的年代问题，纠正了明人在一些碑铭及著录中臆测其始凿于唐的说法^③，认为“宝顶造像为南宋大足僧人赵智凤一手所经营，历数十年，未竟全功而歿”^④。同年王恩洋在《文教丛刊》发表《大足石刻艺术与佛教》，就石刻造像与佛教、经典、信仰间的关系问题做了探讨。

1949 年后，随着政府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1952 年成立了大足县文物保管委员会，大足石刻研究活动渐有起色。然未几便经历“文革”，研究工作又跌入低谷十余年。1949~1980 年，发表或整理的成果有资料、图册、论文等，其中图书类以图册为主，数不足十，理论文章三十余篇。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1954 年《大足县文物调查小结》，这是一份由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第一调查小组对大足境内石刻、寺观及古墓等遗迹进行调查后

^① 参考《民国重修大足县志》，重庆：中国学典馆北泉馆分社印行，1946 年。

^② 在 1945~1949 年间，有关大足石刻文章十余篇。除《大足石刻图征初编》中 7 篇文章（包括《序》《剧本》各一篇）外，另有文 8 篇：吴显齐：《介绍大足石刻及其文化评价》（《新中华》1945 年第三卷 7 期）；吴显齐：《大足石刻印象记》（《和平日报》1947 年 1 月 20、21 日）；王仲博：《大足石刻参礼》（《旅行杂志》1946 年第 7 期）；李德芳：《记四川大足宝顶山唐宋石像》（《南方杂志》1946 年第 1 期）；杨家骆先后发表的大足龙岗（北山）、宝顶山及以外区《石刻记略》三篇（《中央日报·文物周刊》1947 年 2 月 2 日、9 日、16 日）；王恩洋：《大足石刻艺术与佛教》（《文教丛刊》1947 年第 7 期）。

^③ 明成化十年（1474 年）寺僧超禅《恩荣圣寿寺记》碑云：“宝顶寺僧超禅口口口唐宋年间，乃毗卢佛化身柳、赵二本尊开建古迹道场。”明弘治十七年（1504 年）曹琼《恩荣圣寿寺记》碑云：“重庆郡属邑曰大足，去城东三十里有山曰宝顶，有寺曰圣寿，建立自唐至宋熙宁间。”（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名胜记”条云：“《志》云：宝顶寺者，唐柳本尊仿吴道子笔意，环岩数里凿浮屠像，奇谲幽怪，古今所未有也。”等等。

^④ 《中央日报·文物周刊》第 21 期，1947 年 2 月 9 日。另见刘长久、胡文和、李永翹：《大足石刻研究》，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年，25~27 页。

整理的资料汇编，其中汇集了当时大足相对完整的石刻档案资料。1955年陈习删著《大足石刻志略》，全书约十七万字，以油印本形式少量发行。该作分为《序略》《别略》《论略》三章，重点对北山、宝顶山、南山、半边庙、石篆山、石门山、妙高山七处造像、碑铭、题记等进行了较细的考证论述，兼及探讨了大足石刻之历史、宗教与艺术价值，是为有关大足石刻的第一部研究性著作^①。1970年，杨家骆弟子陈清香硕士学位论文《大足唐宋佛教崖雕之研究》，文章以四川佛教艺术发展为背景，在对大足石刻做出概览的前提下，从宗教学、图像学、考古学的角度探讨了有代表性尊像、经变与本生故事等。在当时是一篇比较专业的学术论文，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②。另有日本学者栗原益男与日野开三郎著文对北山韦君靖碑所涉唐末军事势力及建制等问题做了考证^③。另外，1957年，张松鹤、温廷宽、潘绍棠、孙善宽等在《美术》《文物参考资料》《人民日报》等刊物发表文章，从艺术角度介绍了大足石刻的情况。同年傅扬编图册《大足石刻》作为“群众美术画库”之一出版，书内选取北山与宝顶山有代表性造像以图文结合形式做了介绍^④。类似的图册还有1958年中国美协四川石刻考察团、1962年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编的《大足石刻》等。

经上述梳理看出，起步时期最主要的工作是对北山、宝顶山、南山等几处重点石刻区进行了窟龛编号、内容辨识、年代推断、数据登记等，尚有大量石刻造像区未被发现。从研究的成果分析，体现三个特点：第一，研究总体进展缓慢，成果数量偏少；第二，大多成果以石刻概况的浅层次介绍为主，且艺术鉴赏性的探讨占据了一定的篇幅；第三，研究群体规模较小，具有深层次研究性质的著述欠缺，有待全面展开。

二 初步发展期（1981~2000年）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大足石刻研究步入正常、有序的轨道。1999年，以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为代表的石刻造像被列入世界遗

^① 陈习删著，胡文和、刘长久校注；《大足石刻志略校注》，刘长久、胡文和、李永翹：《大足石刻研究》，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185~355页。

^② 陈清香：《大足唐宋佛教崖雕之研究》，（台湾）“中国文学院艺术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70年。

^③ （日）栗原益男：《论唐末土豪的地方势力——四川韦君靖的情况》，《历史学研究》1960年第243号。（日）日野开三郎：《唐韦君靖碑中应管诸镇寨节级的一点考察》，《和田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讲谈社，1961年。

^④ 傅扬：《大足石刻》，北京：朝花美术出版社，1957年。

产，更加促进了研究事业的发展。简言之，首先，研究队伍日益壮大。1982年，成立了大足石刻研究学会，每三年举行一次学术年会，至2000年已举办五届，会员由开始50余人发展到200余人。其次，研究领域逐步拓展，内容关涉石窟年代、龛窟造像、碑铭题记、佛教宗派、工匠群体等。随着调查工作的继续与深入，一些早期所忽略的石刻遗迹点不断被发现。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研究对象以北山与宝顶山石窟寺为主，兼及向周边其他石刻区横向扩展。

本阶段20年，正式发表和出版的各类著述有580余篇（部），其中著作70余部，文章500余篇。梳理本阶段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方面问题的探讨。

（1）综合类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资料性著述的出版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便利。1984年，四川省社科院与大足县文管所派出专人对大足石刻再度做了详细调查，之后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编订成《大足石刻内容总录》（李永翘、胡文和执笔），其中所记石刻区共44处，龛窟606座，此为当时大足石刻最为详尽的内容资料^①。1987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大足又发现31处石刻点，其总数增至75处。1999年，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大足石刻研究院前身）对75处石刻区约十万字的碑铭题记经搜集整理后编纂为《大足石刻铭文录》^②，共收铭文1009件，是继《大足石刻内容总录》后又一重要的资料汇编。同时，图录资料也广为公布。1999年，《中国石窟雕塑全集·大足卷》《大足石刻雕塑全集》相继出版^③。在此之前还出版了一些中、外文版图册，如《大足石刻》^④《中国大足石窟》^⑤《中国大足石刻》^⑥等。

这一时期论文性著述有：大足石刻研究学会于1983年创办了首个刊物《大足石刻研究通讯》（内刊），成为本时期展示研究成果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之一。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等编辑《大足石刻研究文集》（1、2），阶段性选取重要科研文章结集出版^⑦。代表性

^① 李永翘、胡文和：《大足石刻内容总录》，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

^② 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重庆社科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大足石刻铭文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

^③ 李已生：《中国石窟雕塑全集·大足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重庆出版社：《大足石刻雕塑全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

^④ 陈明光：《大足石刻》（中、英、日文版），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82年。

^⑤ 白自然：《中国大足石窟》（英、法文版），北京：外文出版社，1985年。

^⑥ 王庆瑜、郭相颖、黎方银：《中国大足石刻》（中、英文版），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

^⑦ 2000年以前《大足石刻研究文集》编有2册，其中录研究性文章80余篇。参考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大足石刻研究文集》（1），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四川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大足石刻研究文集》（2），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年。

的专著，如黎方银《大足石窟艺术》、郭相颖《大足石刻艺术》是对北山、宝顶山、南山等代表性窟龛造像的整体性研究^①。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艺术》、刘长久《中国西南石窟艺术》等著述涉及大足石刻艺术^②。另有两篇台湾硕士学位论文也值得一提，刘佩瑛《宋代西方净土变相之研究——以大足宝顶山为例》，文章以大足宝顶《观经变》为中心，在分析其内涵、风格及时代意义的基础上对宋代西方净土变展开图像学研究^③。黄锦珍《宝顶山大佛湾本尊教造像的研究》，以宝顶石窟寺造像所代表的意义，建构出“赵智凤派”佛教的形貌，包括论及教主行持侧重点、信仰对象的内涵及后继者传承等问题^④。

（2）窟龛年代的考证

窟龛年代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宝顶山与北山石窟寺。关于宝顶石窟的年代，1945年考察团断定为“南宋”赵智凤时期。20世纪80年代伊始，有学者认为其“开创于初唐，经五代、两宋，历数百年而成”^⑤。作为回应和再次阐明此问题，胡昭曦^⑥、东登^⑦、陈明光^⑧等著文加以反驳，重申“南宋”说。自此争议渐息，关于宝顶石窟寺营建于南宋淳熙至淳祐间（1174~1252年）成为学界共识。

北山石刻群留有诸多碑铭及造像、妆銮题记，大量的年代信息为其断代提供了依据。因之，除了个别造像外，大部分窟龛的年代问题相对明晰。1988年黎方银、王熙祥《大足北山佛湾石窟的分期》一文对北山佛湾290龛造像做了细致的年代分期考证^⑨。

另有1996年宋朗秋《大足石刻分期述论》，对当时统计的大足境内70余处石刻做了

^① 黎方银：《大足石窟艺术》，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郭相颖：《大足石刻艺术》，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

^② 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艺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刘长久：《中国西南石窟艺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③ 刘佩瑛：《宋代西方净土变相之研究——以大足宝顶山为例》，（台湾）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97年。

^④ 黄锦珍：《宝顶山大佛湾本尊教造像的研究》，（台湾）华梵大学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98年。

^⑤ 李正心：《也谈宝顶山摩崖造像的年代问题》，《文物》1981年8期。

^⑥ 胡昭曦：《大足宝顶山石刻浅论》，《乐山市志资料》1983年3期；又见前引刘长久、胡文和、李永翘：《大足石刻研究》，65~76页。

^⑦ 东登：《再谈宝顶山摩崖造像的年代问题》，《文物》1983年5期。

^⑧ 陈明光：《试论宝顶山造像的上限年代》，《四川文物》1986年《石刻研究专辑》，46~48页。

^⑨ 黎方银、王熙祥：《大足北山佛湾石窟的分期》，《文物》1988年8期。

整体性分析，依据各处造像明确的年代题记，将其划分为唐、前后蜀、两宋、明清民国四个时期^①。

（3）造像专题研究

这一时期以单一窟造像的专题研究占据了一定篇幅，在研究趋势上由以往宽泛的浅论逐步向深入探究迈进，另外，道教造像也受到关注。佛教造像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宝顶山与北山两处石窟寺。代表性的成果有龙晦、胡文和、孙修身、镰田茂雄等对宝顶山《父母恩重经变》在梳理《父母恩重经》历史背景的基础上，通过文献分析与图像对比，重点考证了此龛造像之经典依据^②。王熙祥、黎方银、胡文和、陈明光等通过对大足与安岳《柳本尊十炼图》的比较，对宝顶山第21窟的内容、年代、由来等问题进行了考证^③。史岩、龙晦、胡良学、宋朗秋等对宝顶山第30窟《牧牛图》从艺术、宗教、哲学角度加以论述^④。方广锠对宝顶山小佛湾“大藏塔”的经名出处做了考订，认为录自《开元释教录·入藏录》^⑤。宋朗秋、孙闯针对宝顶山和剑川石钟寺十大、八大明王造像，就其经典依据、图像粉本、地域特色等问题作了比较性的探讨^⑥。陈明光、顾森对石篆山“志公和尚”龛内容进行了重新辨识，纠正了过去“鲁班”之说^⑦。另有李显文《大足北山佛湾摩崖造像第245窟中反映的唐代建筑及结构》、曹丹《一幅名画到石刻艺术——谈大足北山〈维摩问疾图〉》、刘旭《大足北山佛湾第149号石窟手铳管

^① 宋朗秋：《大足石刻分期述论》，《敦煌研究》1996年3期。

^② 龙晦：《大足佛教石刻〈父母恩重经变像〉跋》，《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3期；胡文和：《大足宝顶〈父母恩重经变相〉研究》，《敦煌研究》1992年2期；孙修身：《大足宝顶与敦煌莫高窟佛说父母恩重经变相的比较研究》，《敦煌研究》1997年2期。镰田茂雄：《大足寶頂山石刻の思想史的考察》，《國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学研究紀要》第二号，平成十一年（1999年），1~55页。

^③ 王熙祥、黎方银：《安岳、大足石窟中〈柳本尊十炼图〉比较》，《四川文物》1986年S1期；胡文和：《安岳、大足“柳本尊十炼图”题刻和宋立〈唐柳居士传〉碑的研究》，《四川文物》1991年3期；陈明光：《四川摩崖造像柳本尊化道“十炼图”由来及年代探索》，《四川文物》1996年1期。陈明光、胡良学：《四川摩崖造像“唐瑜伽部主总持王”柳本尊化道“十炼图”调查报告及探疑》，《佛学研究》1995年4期。

^④ 史岩：《大足石雕〈十牧〉散记》，《新美术》1993年3期；龙晦：《大足佛教石刻〈牧牛图颂〉跋》，《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4期。胡良学：《大足石刻禅宗〈牧牛图〉管见》，《佛学研究》1997年6期；宋朗秋：《大足石刻〈牧牛图〉艺术的美与宗教义理的结合》，《雕塑》1998年4期。

^⑤ 方广锠：《四川大足宝顶山小佛湾大藏塔考》，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大足石刻研究文集》（2），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年，179~221页。

^⑥ 宋朗秋：《大足宝顶山与剑川石钟山十大、八大明王的比较研究》，《敦煌研究》1999年3期；孙闯：《〈十大明王〉造像方法谈——走进大足石刻》，《雕塑》1999年1期。

^⑦ 陈明光：《大足石篆山石窟“鲁班龛”当为“志公和尚龛”》，《文物》1987年1期；顾森：《大足石篆山“志公和尚”龛辨正其它》，《美术史论》1987年1期。

窥》、黎方银《大足北山多宝塔内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石刻图像》等对北山部分造像展开个案研究^①。

道教造像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南山、石门山、舒成岩等几处石窟，重点对其造像内容展开辨识与讨论。主要以陈澍、石衍丰、胡文和、李远国、王家祐等学者的研究为代表^②。成果总量较少，整体研究还处于相对薄弱的局面。

此外一些窟龛或造像的调查简报也是本阶段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如1994年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发表的《大足宝顶山小佛湾祖师法身经目塔勘查报告》《大足尖山子、圣水寺摩崖造像调查简报》《大足宝顶山小佛湾“释迦舍利宝塔禁中应现之图”碑》与《大足宝顶大佛湾“牧牛图”调查报告》^③。1996年童登金、胡良学《大足宝顶山大佛湾“圆觉经变”窟的调查研究》与邓之金《大足宝顶山大佛湾“六耗图”龛调查》，1998年胡良学、陈静《大足石篆山、妙高山摩崖造像的调查研究》等^④。

（4）碑铭题记的考释

大足石刻有着十余万言的铭文，内容涵盖经文偈语、造像信息、祷词愿文、人物历史、诗文游记等，是关涉宗教、历史、艺术、人文等方面极为丰富的文献，《大足石刻铭文录》是对其系统的辑录。本阶段涉及碑铭题记的研究有刘豫川、刘蜀仪、李胜、陈汝

- ① 李显文：《大足北山佛湾摩崖造像第245窟中反映的唐代建筑及结构》，《四川文物》1986年“石刻研究专辑”；曹丹：《一幅名画到石刻艺术——谈大足北山〈维摩问疾图〉》，《文史杂志》1987年6期；刘旭：《大足北山佛湾第149号石窟手铳管窥》，《四川文物》1994年2期；黎方银：《大足北山多宝塔内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石刻图像》，《敦煌研究》1996年3期。
- ② 陈澍：《初析大足南山石刻中的道教思想》，《中国道教》1987年3期；胡文和、刘长久：《大足石窟中的宋代道教造像》，《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3期；石衍丰：《试释大足南山“三清古洞”石刻造像》，《四川文物》1989年2期；胡文和：《大足南山三清古洞和石门山三皇洞再识》，《四川文物》1990年4期；李远国、王家祐：《大足三清洞十二宫神考释》，《四川文物》1997年2期。
- ③ 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大足宝顶山小佛湾祖师法身经目塔勘查报告》，《文物》1994年2期；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大足尖山子、圣水寺摩崖造像调查简报》，《文物》1994年2期。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大足宝顶大佛湾“牧牛图”调查报告》，《四川文物》1994年4期。
- ④ 童登金、胡良学：《大足宝顶山大佛湾“圆觉经变”窟的调查研究》，《四川文物》2000年4期；邓之金：《大足宝顶山大佛湾“六耗图”龛调查》，《四川文物》1996年1期。胡良学、陈静：《大足石篆山、妙高山摩崖造像的调查研究》，《四川文物》1998年1~2期。